

116 趟“航班”组成的小说

——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云游》

■冯新平



《云游》

[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
于是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作品蜚声祖国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又凭借《云游》入围2018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而获得英语读者的关注,而紧随其后荣获的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奠定了她在国际上的文学声誉。这位当今欧洲最大胆、最具独创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散文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特立独行的世界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倾向与她天马行空的文学作品一样引人注目或备受争议。虽然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一直在过去与现在、真实与神话之间穿梭,但《云游》却是一部展现其文学抱负、叙事风格以及广泛兴趣的标志性作品。

确切地说,《云游》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甚至不像是一个交织一起的短篇小说集,尽管其中有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以重复出现的人物和发展完善的叙述为特色。大体而言,这个由116个联系松散的片段组成的作品是一部关于旅行和人体的小说。其中一些故事由一位在全球各地走走的无名女子讲述,另一些是在语境全无的时空中出现。如此一部拒绝统一性的作品因叙述者谦逊、幽默和好奇的声音而凝聚在一起。小说的波兰语书名既指原始的徒步旅行方式,也是18世纪俄罗斯东正教某个门派的名称,其成员信仰只有不断地移动才能逃避魔鬼的伤害,犹如这个教派现代成员的叙述者在穿越边境、机场用餐以及酒店与陌生人攀谈时最是感到自由自在(这部著作的英文名有“航班”的意思)。

具体而微,《云游》就像是一个古董陈列柜或自然博物馆,而阅读的过程犹如打开一个个放置宝藏的大小不等的抽屉。其中有

妻子和孩子度假时失踪的男人的故事,有悲痛欲绝的女儿写给18世纪国王的信件,后者将她父亲的尸体用干草填满并公之于众。生物学家回到她几十年前逃离的波兰,为了给她的大学恋人实施安乐死。古典主义者的妻子思考着神话和死亡。旅行心理学家在机场候机室给人们讲课。解剖学家的女儿想要成为公海上的水手。而痴迷于解剖的医生则试图从他妻子那里窥探死人的秘密,如此等等。这些让人感觉奇怪而超现实的人物在大卫·林奇的电影中或许会更加自在。

与小说片段式的写作方式相对应的是人物之间彼此的隔膜与孤立。这样的架构恰如摆放随意甚至凌乱的陈列室,虽然古代的泥塑与现代的雕刻没有任何关联却并不妨碍它们共存,一如天南海北的旅客机缘巧合地乘坐同一趟航班。试图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就像往嘴里一次塞满一盒巧克力一样会让你很不舒服。不妨以一种悠闲的节奏来开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阅读旅程,这自然会让需要故事情节、热爱线性叙事的读者感到沮丧。但对于那些喜欢在地图边缘以外旅行的人们来说,《云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此而言,颇为传神的中文译名不仅将作品自由自在的核心主旨与漫无目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来,而且其“上天”(飞机旅行)“入地”(人体探索)的传奇故事也与作者自称的“星群小说”相匹配。

虽然托卡尔丘克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但她最初却是以出版于1987年的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在波兰文坛崭露头角。《云游》遵循一种类似于诗歌的联想逻辑,利用意象和模式把不同叙事时空中的人物和情境串联起来。酒鬼埃里克出狱后对其渡轮售票员的生活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开始怀有杀人的幻想,“他已经稳稳地望向海平线了,笔直的映像在他的瞳孔上横切而过,上半部是天空的白光,下半部是海水的深蓝。”一个片段之后,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岛屿心理学”中。叙述者认为“岛屿”象征了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其囿于自身界限的状态与自恋或自闭的状态有相似之处,“自给自足。只有自己看似真实;他者不过是幽冥缥缈,不

过是乍现在遥远海平面上的‘飞翔的荷兰人’号幽灵船。事实是:谁也不能百分百确定那不是幻想出来的;当眼睛习惯了将视野干净利落落地且分为上下两半的笔直的分界线,谁也不能确定那不是眼花后的缭乱幻想。”

通过这幅图景及其回声,一种危险的、唯我论的心理状态被敏锐地传达出来。尽管埃里克的自恋有着严峻的意味,但变化不定的叙述形式超越了简单而便利的因果模式,让读者以一种类似同心圆效应或连点游戏的方式理解累积语境下更大画面中这位孤独者的生活。而正是在对叙事场景与情境的吸收和反射中,托卡尔丘克实现了叙述和旅行的完整。这些片段从第一人称叙述到第三人称视角的无缝切换,不仅反映了诗歌的联想思维或旅行者的发散思维,也反映了叙述者在场景累积中向前推进的状态。托卡尔丘克用这样的叙述模式引导读者阅读这本迷宫般的小说。而与梵高的星空一样绽放的叙述相对应的必然是隐伏其中的“时间”主题。

“每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重复任何一个瞬间。基于这种理念,冒险、活到尽兴、把握每一天这些概念就都行得通了。”这其说是关于“时间”的理解,不如说在于揭示一种理解“时间”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意味在于,存在的时间,是与生命相关联的。生命在于时间。如果说存在的秘密在于

时间的觉醒,那么存在的诗意则在于生命的激扬,但这样的状态是不可能出现在僵死的秩序与封闭的空间中。因为,“稍微停顿的人,必将被石化;停下来的人,必将如昆虫般被钉住”。

这样的主题又以不同的表述分散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含了真相……生活是由各种境遇组成的。当然,某些行为确实有重复的倾向。然而,这种重复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想象中屈从于任何一种恒定整体的表象。”旅行心理学家如是说。站在岸边凝视河流的叙述者意识到,“流动的物事总是比静止的好,哪怕,流动会带动出各式各样的风险;相比于恒久不变,改变总是更高尚的;静止的物事必将衰变,腐败,化为灰烬,而流动的物事却可以延续到永远。”这些人物“说”出来的主题在另一些人物那里则是通过“做”的方式呈现的。如逃离莫斯科公寓严酷日常生活的安娜,跑到教堂不是祈祷而是哭泣。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只有动起来,离开原地的時候,才能逃脱魔掌,如此等等。无论是振奋人心的“言”,还是生生不息的“行”,都是《云游》的形而上叙事引擎。这就是托卡尔丘克文学世界的本质,看似随意的元素在复杂的和声中产生共鸣。

《云游》的叙述是细致的,但其结构却是混沌的。虽然有分节,但各节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顺序可言。阅读它可以从中任何一节进入或淡出,可以从一个短故事跳跃到另一个短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人物跳跃到另一个人物。与混沌的结构相应的是开放的结尾。全书叙述结束于叙述者准备登机开启崭新旅行的场景。这样的旅行与其说是支离破碎的,不如说是生生不息的。

微尘里的光芒

■郭梅

民国时期,不仅有时代的交锋,还有学术的锋芒,其中涌现出了以胡适、陈寅恪、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民国文人,更是让这个时代充满了思想的交锋与对流。刘克敌先生新著《民国学风》所记录的,正是这一时期这些文化大师们的群体往事。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刘克敌就关注民国文人与文化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师级人物,所以他才能如数家珍般将这些文人的学术观念、思想内蕴细细体现在字里行间——他将深邃的文化底蕴倾注于日常的叙事之中,通过探寻文人的日常交往、日常起居等,进一步研究他们普遍生活模式下所投射的文化风骨与翰墨风雅。毋庸讳言,文人在创作之余也面对着生活的考验,会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忧,也会因版权费而对簿公堂,更会因处境困窘而受人救助……在热闹喧腾的烟火气息中,他们丰满而生动。

在大量的信件与日记中,我们似乎能窥见刘克敌先生的深意——他藉对私密性的材料进行归类分析,从而得出了出乎意料却又合情合理的结论。如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

恪先生,他在1925年被清华聘任之时,其实尚在德国留学。他留学欧美多年,既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也没有发表有重大影响的论著。迄今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最早发表的具有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过是1923年刊登在《学衡》上的《与妹书》(节选),寥寥数百字而已。而其他三位导师的名声与威望却远超前于他。但正是这位看似默默无闻的读书人,却受到了吴宓、赵元任等学者的大力褒赞——显然,这是旧时文人对于“博学知服、虚己从善”学风的认同与贯彻。若非如此,恐怕陈寅恪任教清华一事就困难重重了,更不用说形成“四大导师”聚首清华的盛况了。因此,当我们以“民国”的形式观察整个时代,总能知微见著,以小见大,更易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带领读者重温民国学风的同时,刘克敌也让我们看到了民国大家们身上的特质,尤其体现在做人的大节上——如居心的正直、对国家的忠贞、“民胞、物与”的胸怀、“无我、无私”的风度以及“仁以为己任”的抱负。诚然,他们是不尽相同的个体,会因论点不同而剑拔弩张,甚至因为学术争议而分道扬镳,但他们真正令人钦

佩的,正是他们始终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坚持,毅然走向不同的路途。尽管很多时候“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像胡适与梅光迪等友人之间关于白话诗的分歧,竟然催生出了一场新文学的革命。刘克敌认为:“与其说是和两人的文学观念不同有关,不如说和他们两人都具备的不服输和争强好胜性格有关。只是胡适相比于多少更趋于空谈的梅光迪,更愿意深入思考也更愿意做一些具体的实践也即尝试写白话诗,所以辩论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可想而知。”事实上,从信件中不难发现,胡适与梅光迪就“文学革命”的看法从一开始是一致的,只是他们个人性格上的差异造就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史上的改革。在本书中,胡适与梅光迪之间的文学之争尤为精彩,即便一方注定是历史的逆流者,但个体间的偶然小事其实也能成为触发历史进程的种子,如此看似随意其实精彩深邃的哲学思辨,或许能让人更全面地看待当时知识分子各自的成长之路。

鲁迅曾在病中的日记中如是说:“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

刘克敌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将生活下去。”从人性的视角来看待民国的文化大师们,褪去了“神化”色彩的他们反而更具真实的温度,“困惑”与“彷徨”亦伴随了他们一生。当回到“历史的现场”,“民国”这个让人陌生的字眼显得分外寂寥。马一浮早年便相继失去了家人,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吴虞一直偏居四川,极其恶劣的人文环境与生活环境让他十分压抑,还有鲁迅和钱玄同那段有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说明鲁迅内心始终还是悲观绝望的,但是他们依然寄情文学,将喧嚣撇于身外,以笔墨增添了风花雪月的情怀。《民国学风》虽解读的是文人的生活个案,但也提供了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史的全新视角,让人在走入文人心灵世界的同时,触摸历史的不同维度。从走向大师到走近大师乃至走进大师的内心,该书显然为读者指出了一条曲折但可能是正确的途径。